

海外观察

给富人加税是一个错误信号

□金皎皎

16世纪中叶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混战时代,各国诸侯互相提防,关卡林立。但尾张诸侯织田信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幅降低赋税,拆除关卡促进自由贸易,商人、财富和信息迅速涌入尾张,其实力迅速壮大,织田最终得以纵横天下。

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一定会流向更加开放、赋税更低的国家。即使是在日本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森严壁垒也无法阻止财富向具有更优秀制度的国家汇聚。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资本、人才和产业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制度竞争远比武战时期的日本更加严峻和紧迫。因此,一个国家对财富和资本发出何种制度信号,可能影响其未来多年的经济竞争力。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少国家都发出了给富人加税的制度信号。在英国,年收入15万英镑(即24万美元)的富人税率被提高至50%,英国副首相甚至提议加征“失享税”;在美国,给富人加税已成为总统奥巴马的道德大旗,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富人加税也成为其唯一可以夸耀的“政绩”;在法国,左翼总统奥朗德上台之后,对富人征收75%的重税也成为其新政治标志。

要求给富人加税的呼声之所以在当令颇有市场,一方面是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另一方面,对富人加税也被不少政府视为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对富人加税并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煽动仇富情绪的政治戏码更是释放出了极其错误的制度信号,将损害一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富人是流动性最大的阶层,也是对税率最为敏感的阶层。在奥朗德颁布对富人征收75%重税之后,法国著名影星“失鼻子”杰拉尔·德帕迪约宣布放弃法国国籍,加入了俄罗斯国籍。这并不是法国左翼政客第一次吓走富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密特朗上台后,路易威登的CEO贝尔纳·阿尔诺曾一度避居美国三年,去年奥朗德上台后,他又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

在大西洋彼岸,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去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2011年,和萨维林一样为了避税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多达近两千,是三年前的八倍。如今全球经济越来越开放和自由,放弃一国国籍的难度也越来越低,这意味着高税收吓走富人的概率越来越大,这也要求各国领导人对税率问题必须比以往更加谨慎。

况且,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富人的避税能力是最强的,即使不移民,富人也有多种方式避税,导致加税措施“口惠而实不至”。英国从2009年决定将富人税率提高至50%,还推出针对银行家的50%红利附加税。但一年多以后,连英国财政大臣达林也承认,加征红利附加税的政策无效,因为银行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避税。而英国财政部的统计也显示,对富人加税之后,政府收入并没有如预计那样增加。

此外,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富人的转移税负能力是最强的,因此对富人增加的税负可能最终转嫁到穷人身上。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如果针对他的税负提升了,他既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让消费者分担税负成本,也可以通过削减成本让员工来分担税负成本。两种结果的实际受害者,可能恰恰是对富人加税政策希望帮助的中低收入阶层。

指望对富人加税可以解决财政问题更是缘木求鱼。和为之投入的政治资源相比,给富人加税带来的效益可谓微乎其微。在法国,75%的重税每年只能增加2.1亿欧元的政府收入,仅占政府增税目标的1%。在美国,奥巴马力推的对富人加税政策,今年估计可给联邦政府增加200-300亿美元的税入,但相比万亿美元左右的年度赤字,这场艰难的政治战役只解决了2%-3%的财政问题。可以说,富人税问题导致美国财政改革努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富人加税非但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将损害企业家精神,威胁经济活力。富人收入中税收占出的比例越高,意味着投资再生产占的比例就越低,这意味着政府赋税将会挤出私人投资。而如果富人减少投资,就会减少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将受损,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小。因此,对活着的富人降低税收将刺激经济,而对死了的富人增加税收(遗产税)才是实现社会再分配的合理方法。

通过富人税问题煽动仇富情绪是政府无能的表现。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应当通过惩罚富人,而应当通过帮助穷人。因此,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贫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重点不在限制富人更富,而是避免穷人更穷。

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动向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虽然政治是国内的,但影响是国际的。虽然对富人加税这样的政策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却可能造成一国制度的比较劣势,进而损害其发展前景。一国政治领袖在做决定之前,务必应考虑其政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

海外聚焦

□本报记者 陈昕雨

查尔斯和大卫·科赫兄弟二人掌控的美国科氏工业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兄弟二人各以250亿美元资产并列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2位。据外媒估算,由于公司未上市,科赫兄弟实质上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隐形富豪”。在苦心经营家族企业的过程中,科赫家族未能避免内斗,兄弟四人曾对簿公堂,在美国家族企业史上被称为“该隐与亚伯的战争”。《福布斯》还将科赫兄弟称为世上最有权势的50人之一,他们在美国政坛和财经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雄心勃勃渴望改造美国,是最令美国总统奥巴马头疼的富翁。

科氏工业:不上市的“巨无霸”

科氏工业集团总部位于美国堪萨斯州,集团雇员超过6万人。集团业务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农业和畜牧业、金融服务、道路沥青等。科氏工业的核心业务是石油化工,拥有4000英里油气管道,炼油能力可满足美国5%的能源日常需求,是美国第6大电力供应商。集团还拥有北美最大的液化石油气加工集团,业务占北美市场总量的25%。据不完全统计,科氏工业集团年销售额逾500亿美元。

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科氏工业并不公布详细经营和财务数字,只有穆迪和标普两家评级机构能够获得该集团信息。目前,两家机构给予科氏工业的评级分别为Aa1和AA+。

科氏工业集团成立于1918年,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集团现任掌门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查尔斯和大



新华社图片

卫·科赫兄弟是家族第二代接班人。在全球家族企业中,科氏工业的历史不算悠久,但在不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能够完全凭借私人资本扩张至全球最大的私营企业,可谓成就斐然。

科氏工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收购,收购资金主要靠科赫家族的资本,而非从资本市场融资。自1946年起,科氏小试牛刀,收购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岩石石油和炼油公司。直至2005年,科氏收购了乔治亚太平洋公司,这是科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宗并购交易,并由此一举超越嘉吉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私营企业。

科氏工业主要采用“奥地利学派教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经营理念,即推崇分权决策,假定企业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应如何使自身利润最大

化。据外电报道,若科氏上市,其市值将与麦当劳匹敌,可轻松跻身全球前40强公司,不过查尔斯曾撂下狠话,“除非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查尔斯之父、科氏工业的创始人弗雷德·科赫在将公司“权杖”交给儿子时曾说:“只要不将公司卖掉,你怎么办都行。”

据彭博数据,自1960年至2012年底,标普500指数成分股资产平均增长了约70倍,而科氏工业的资产同期增长了超过2200倍。这意味着,若在1960年对科氏工业投资1000美元,至去年年底将获得超过220万美元的收益。但除了科赫家族和少数合伙人外,无人能分享此般高额回报。

兄弟内斗:该隐与亚伯之战

科氏工业创始人弗雷德·科赫出



6%。日元兑美元贬值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需要。虽然日本经济不振的状况已经持续了10多年,但曾被经济问题拖下台的自民党在再次掌权后显然打算重振河山,而突破口就是用日元贬值来提升工业竞争力。

日本公布的去年11月工业生产大幅减少1.7%,比市场预估的0.5%高出两倍多。此外日本12月Markit/JMMA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亦显示该国制造业活动萎缩速度创3年以来最快,这在无形中给日本央行增添了更多压力。

尽管日本央行在去年12月第三次放宽货币政策,且今年日本央行将向市场注入资金的资产购买方案规模扩大了四倍以上,从去年年初的20万亿日元扩至101万亿日元(合1.2万亿美元),但新上台的安倍政府仍持续向央行施压,以敦促其更大力度地采取货币刺激措施。

华尔街夜话

感受“赌城”科技风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提起“赌城”拉斯维加斯,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这座不夜城的博彩业。夜幕降临之时,这座屹立于沙漠之上城市的魅力才开始慢慢展现。

拉斯维加斯闻名于世的不仅是遍布城市每个角落的赌场,颇具影响力的会展也在这里轮番上演,每年1月举行的消费电子展就是一年一度消费电子行业的盛会,把这座城市的酒店业、博彩业和会展经济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为“赌城”增添了更多生机。

经过46年的历练,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展会更是在展出面积和参展厂商数量上再创新高。展会总面积是有37个足球场大,参展的厂商超过3200家,展览期间发布的新品超过2万件。

在展览现场,参观者摩肩接踵,各种新品让人目不暇接。尽管消费电子行业“大佬”苹果和微软没有专设展台,但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无处不在的影响力。苹果相关配件设有专门的展区,而搭载微软最新开发的Windows 8系统的各式电子产品也成为关注焦点,加上三星、索尼、松下、佳能等耳熟能详

的品牌,人们在这里能触摸到消费电子行业创新的脉搏。

世界最大的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总裁雅各布今年替代微软CEO鲍尔默为消费电子展作开幕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生而移动”。雅各布斯认为,智能手机正取代笔记本电脑成为移动设备的主流,对一些人而言,智能手机将成为上网的唯一方式。他还现场发布了两款专为高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设计的芯片。

高通的高调现身一方面是该企业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同时也预示着高精尖的芯片技术将成为未来消费电子行业竞争的一大核心。

越来越大的智能手机,越来越薄的平板电脑,画质4倍于普通高清电视的超高清电视,一件件炫目的展品展示出消费电子行业对于卓越的不懈追求;而搭载智能操作系统的汽车,能边播放节目边连接社交网络的电视,能用手机应用控制的家电,则令人们对未来的智能生活充满憧憬。

手机的功能远超过通讯,相机不再单纯拥有拍照功能,电脑也不再局限于办公,消费电子行业移动和集成的发展趋势迎合了消费者对电子产品个性化和多功能的要求,

安倍表示,日本央行应根据使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的需要发行货币,他甚至发出威胁,如果央行不采取更多的积极宽松措施,就要修改保证央行独立性的日本央行法。

面对日本的事态发展,金融城的投资者纷纷抛售日元。而作为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三种国际化货币之一,日元的增发贬值难以避免出现溢出效应,对他国造成影响。如果日本通过货币贬值提振经济,在经济环境整体疲软的环境下,这种以邻为壑的手段很可能被其他希望看到类似结果的国家效仿,这无疑将导致一场新的货币战争——至少会引发贸易战。无论哪种结果,都是目前步履蹒跚的全球经济所不愿看到的。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英格兰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迪安妮·朱利叶斯认为,目前量化宽松支撑了银行,但没有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对储户和养老金基金产生的负面作用正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外部危机可能会引发大的金融震荡。

苏格兰皇家银行预测,2013年美元兑日元可能升至90日元左右,这是美元兑日元201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金融城里的不少分析师将日元迅速贬值看作是潜在的外部危机,但至少日本方面并不这么认为。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近期就公开称日元市值仍被高估,黑田的观点在尽量向政府靠近,因为3个多月后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任期将满,他可能会成为新的候选人。

也代表着移动数字化生活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一招鲜,招招先”是消费电子行业创新实力的鲜活写照。行业领头羊将拥有定义行业未来趋势的能力,而追随者将面临行业合纵连横中的残酷竞争。

这些日新月异的创新产品在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彻底革新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根据展会期间公布的数据,去年一年,全球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量大幅增长,成为了消费电子行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难以抗拒的移动潮流席卷而来,消费者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日渐加深。智能手机日益成为我们须臾不离身的万能信息管家和实时通讯助手。据统计,目前拥有智能手机的用户平均每天低头看手机的次数约为150次,而大多数并非是为了打电话。

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笔者看到航空公司一则最新的服务广告——当飞机飞行高度超过1万英尺后,可以打开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申请使用航空公司提供的无线网络,及时与朋友交流信息。可见,即使在几万英尺的高空,移动设备和网络依然可以把人们紧密相连。

生于1900年。其父哈里·科赫于19世纪末期从荷兰移民至美国,并在得克萨斯州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报纸及印刷厂。弗雷德不甘在父亲的印刷厂工作,他对化学很感兴趣,17岁时进入休斯敦莱斯大学学习工程学,大二时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从事化学工程师的工作。

在弗雷德的四个儿子中,老三大卫与老四比尔是一对双胞胎。老二查尔斯出生于1935年,最得父亲疼爱与器重。22岁时,查尔斯获麻省理工学院通用工程学士学位,后获核工程、化学工程两个硕士学位。据《福布斯》统计,查尔斯和大卫的个人资产均达250亿美元,是纽约市最富裕的居民。

据查尔斯回忆,父亲弗雷德是一位“坚强而有领袖风范,正直又谦虚,并求知若渴”的英雄式人物。不过英雄也有遗憾,他的子女没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和睦相处,四个儿子在弗雷德去世后决裂,并为争夺家族财产对簿公堂。

1980年,在以11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哥弗雷德里克与老四比尔的股份后,查尔斯和大卫获得了科氏工业的控制权。但比尔不满收购价格,将两个哥哥告上法庭。继而比尔又将矛头对准公司,控告科氏通过谎报采油量等方法从美国土著印第安居民手中窃取自然资源。科赫兄弟间的争斗持续了20多年,官司直至2001年才告终结,被业界戏称为“该隐与亚伯的战争”。

呼吁削减企业税收

科赫兄弟颇具政治头脑,他们一心希望凭借政治力量来保护和推广家族实业和自己的经营主张,并为其政

治理理念不惜血本。

查尔斯和大卫曾尝试跻身政坛,1979年,大卫出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埃德·克拉克的副总统候选人。大卫彼时便预见,由于不满收税政策,美国将出现规模庞大的“紫党”,他们还提议废除联邦调查局、能源部等联邦政府机构,终结社会保障、枪支管制和个人所得税制度。科赫兄弟认为,美国政府只需保留一个功能: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科赫兄弟为竞选花费了逾200万美元,但结果却令其失望,克拉克与大卫的竞选搭档只获得了1%的选票。

竞选失败后,科赫兄弟决定改变路线,从学术机构和智库下手,改变美国政府政策的发源地。科赫兄弟投资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奉行自由主义主张的智库——卡托研究所。该研究所推崇“个人自由、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和平”,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目前,卡托研究所已成为美国著名智库,其观点经常被美国主流媒体引用。外媒甚至将卡托研究所视为对抗奥巴马的工具,而科赫兄弟也成为最令奥巴马头疼的富翁。科氏工业控制的基金会总共向近40个政治和政策组织提供经济资助,这些机构批评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立法、干预经济等政策,并支持削减企业税负。

据报道,在2012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科赫兄弟在选举中向共和党捐资逾数千万美元。选战尘埃落定后,大卫·科赫表示对选举结果极度失望,他称,“我们筹集了很多钱,动员了很多,虽然我们输了,但不会消沉,我们将进行检讨,分析哪些经济政策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我们今后会做得更好。”

海外选粹

美国的欧洲时刻

过去三年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对欧洲人处理欧

债危机的能力颇多微词,无论白宫还是国会均认为,欧盟领导人只会在最后时刻采取短期措施缓解危机,却始终无法找到长期解决方案。尽管美国人言之凿凿,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认为,面对本国财政悬崖问题,美国人的上述言论亦是自掌其脸。

《经济学人》认为,就目前而言,美国人处理财政悬崖问题的手段并不比欧洲人高明多少。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经济学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经济学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经济学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经济学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经济学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盟统一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欧盟必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治本,而建立统一财政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长期磋商,因此目前欧盟仅靠一连串临时性救助措施很

医疗开支不断膨胀,其中医疗开支在未来25年还将加速上涨;另外,此次公布的增收措施并未提供合理性说明,可操作性令人质疑。更重要的是,解决方案未触及美国巨大的结构性预算赤字问题,这就为财政悬崖的再次出现埋下伏笔。

事实上,解决方案的增税目标也远低于预期。造成此种窘迫局面的主因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力图避免纷争、携手应对财政悬崖,因此各有让步,而关乎财政悬崖的根本性问题却被暂时搁置。《经济学人》认为,这与欧盟各成员国解决欧债危机的手段如出一辙,各本

方均想做好好先生,却对原则性问题视而不见。而无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谁都不清楚欧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到底能否解决。

而欧盟经此债务危机之后,已针对超支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养老及医疗改革,美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虽不如欧洲明显,但预算赤字早已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棘手问题,加之消费者信心难以提振,经济走势低迷,美国面临的财政困境并不亚于欧盟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几乎相左的执政理念正在影响美国白宫和国会的施政措施,若不能达成有效共识,美国势必形成分裂态势,这对财政危机的解决将更加不利。

暂时逃过“财政悬崖”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目前更像是仍在危机中煎熬的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美国也也因此“悬崖”经历了所谓“欧洲时刻”。(石璐)

